

论文化建构的双重性

——兼谈生态危机发生的文化本源及其消解对策*

吕永锋

(吉首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人类社会的建构凭借的是文化系统, 因而在讨论人类社会对水土资源的影响时不得不先行讨论文化自身的制衡作用。文化自身的制衡作用来自于文化的建构特点。人类社会现存的文化就其实质而言, 都必然并行着两套建构法则——生物性法则和社会性法则。在同一文化的运行中, 这两套法则既可以紧密地结合起来, 也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当其结合得十分紧密时, 该种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 当其结合紊乱时, 该种文化就会呈现衰败的景象, 并同时对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乃至相关的水土资源构成严重的冲击, 从而引发生态危机。文章重点讨论了文化建构的双重法则及其相互制衡机制, 同时, 从生态危机源自于文化建构的双重性这一理解出发, 提出了对于生态危机的消解对策。

关键词: 生态人类学; 文化建构; 生态危机; 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4)03-003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利用文化制衡作用控制水土流失的可行性研究”(00BZH002)

作者简介: 吕永锋(1978-), 男, 浙江永康市人,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助教。

一、导言: 文化建构存在着两套法则

文化人类学认为, 文化建构的生物性法则和社会性法则是并存的。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总是立足于文化自身去探讨文化的发展和演进, 或者仅把自然因素看作文化的外在因素去加以分析, 而较少考虑文化如何支配人类社会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 文化人类学家才认识到人类社会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从而开始了将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尝试。

最先注意到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对文化特征影响的人是克鲁伯和威斯勒, 他们凭借大规模的田野资料编绘了美国西海岸印第安各部族的地理分布图, 并从中发现不同的地理环境对相关部族的文化特质存在明显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如何发生, 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有多大, 他们并未作进一步的探讨。^{[1](P271-275)} 进一步的探讨完成于斯图尔德。在斯图尔德的论述中, 前人多关注他所提到的文化核心和次级特质,^{[2](P136)} 但却经常忽视他如下一个命题。

尽管最初曾使用过生物集的概念, 但生态

* 收稿日期: 2004-06-13

学的概念自然要扩大到包括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生命网的一部分人。但是,人不仅仅作为体物质上与其他有机体有关的另一有机体进入生态学舞台,他还引进了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3]

斯图尔德认为,人类在生态系统中除了以一种有机体的身份进入之外,还带入了超有机体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包括了那些地球生命体系中所没有的,或在正常状况下所没有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活动内容。这样的内容凭借文化的整合作用被带进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进入地球生命体系运作范围之内。在文化非正常运作的时候,这些内容便会对地球生命体系构成重大的冲击。目前人类社会面对的生态危机与资源短缺其实正是文化非正常运行的结果,而不是文化正常运行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斯图尔德的上述命题已经朦胧地注意到了文化建构的双重性,即文化建构有生物性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社会性的一面。

文化要按照双重法则进行建构,那就意味着文化规约下的人类社会既需要与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同时还需要按无机物运行的规律与无机世界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若没有前一种交换,人类社会就不复存在,人类就只能是一个普通的生物物种。但若包容前一种交换,人类社会又必然与地球生命体系拉开距离,形成一定程度的偏离。这样的偏离,正是我们今天所关心的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危机的由来。因而,要深入剖析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要关注文化建构的生物性,还得关注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只有弄清两者在同一文化运行中的制衡关系,我们才有可能从中找到控制生态危机的手段和方法。

文化运作的前提在于它接受了自成系统的信息控制。既然文化建构并行着两种不同的法则,那么其运行所依赖的信息系统也必然包含了两个不同的信息构成侧面——生物性信息侧面和社会性信息侧面。生物性的信息侧面是人类社会通过认知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而逐步建构起来的,而社会性的信息侧面则主要是人类社会通过认知周围的有机世界、无机世界和人类自身而逐步建构起来的。在这里需要强调“逐步”二字,因为人类社会在进行信息系统建构时,不可能是在透彻了解周围的

世界后才着手进行,而只能就极其复杂的外部有机和无机世界能了解多少应对多少,只有在认知的缺陷暴露出来后再加以修正。在这一不断修正和建构的过程中,文化凭借的信息系统日趋完善。由此可见,文化包容的两个信息侧面也分别是两个随着时间推移而日趋复杂的人类社会节制体系。在这一点上,它与自然生态系统极为相似,其稳态延续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依靠自身结构的复杂性得以维持,一旦受到损害,就不存在自然恢复可能,必须通过新的修正才能重新达成。关于这一点,斯图尔德以后的众多研究者都有所觉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像文化这样复杂的系统不断地自我修正至关重要。^{[2](P137)}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建构可以一劳永逸,而修正所凭借的依据正是文化中包含的这两个信息侧面构成要素间具有互换、互补乃至相互替代的能力。当然,这种互换、互补和替代,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文化建构本身具有双重性,因而始终无法与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持一致。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众多危机都是文化制衡格局的这种运行方式与自然生态系统不相兼容而造成,它绝不是文化中个别要素导致的结果。一切想凭借文化中个别要素的调整去缓解人类危机的各种做法,都是注定无法彻底消除危机的。

二、文化建构的生物性法则

文化建构的生物性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特点。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仅是地球生命体系中的众多物种之一,它必须以其他生物物种为食,生命活动留下的废弃物也要参与其他物种的物质与能量循环。这一点并不因为人类能建构自己的社会而有所改变。这就导致了人类社会无论如何发达,却一刻也离不开地球生命体系。正是对地球生命体系的这一本质性依赖,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建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多线性。

既然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体生存中不可扬弃的一个基本因素,那么,生态的多样性及其本质联系,也就使得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多线性成为必然。^[4]

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可以说,当代世界各民

族文化呈现多样性的重要原因由于不同文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各不相同而导致的结果。人类的文化建构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它所处的那个自然生态系统去展开的,就其对该生态系统的了解而发育出一套该文化特有的信息体系去规约该文化中的个人,从而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保持某种程度的兼容。然后,随着对自然生态系统认识的提升,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信息体系的构成内容。这标志了文化自身的发展。换句话说,文化的建构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它不断地认识和理解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并将这些认识和理解纳入自身建构的信息系统中,以便与该自然生态系统保持一致。

对于复杂的地球生命体系,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全知尽晓,至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内,这种认识 and 理解的欠缺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了。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尽管自然界的灾变与人类社会的运行有关,但绝不是文化有意要对自然生态系统构成损害。文化是在不可能全部了解自然生态系统的情况下对其产生反馈的,因而无法对由此诱发的一切灾难性后果负责。同样地,一种文化既然不能彻底地了解地球生命体系,它当然也就不具备修复生态系统损伤的全部能力,因此要单靠任何一种文化去恢复已经受到损害的水土资源,同样也是办不到的。

鉴于生态危机是20世纪才兴起的热门话题,不少人总以为生态危机是当代人造下的乱子。比如说水土流失灾变被认为是现代人过牧、过垦或过伐的后果。这种提法在一定时空域内可以赢得众多的支持者,但却经受不住进一步的考究。

当代的水土流失灾变总是一个长期积淀的结果,而且是自然水土流失和人为水土流失叠加的产物。后果虽然表现在当代,但酿成灾变的本源却发端于人类早期的文化建构。文化在其建构时并不是照搬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法则,用纯粹的生物信息作为文化自我控制的信息体系,而是按照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以有限的认知为基础,加工改造客观的生物信息去建构文化的信息体系。文化一经建构,其信息体系便已经与自然生态系统拉开了距离,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当代人如果凭借生态学研究的结果对人类的文化进行反思便可发现,无论哪种文化,它所认知的自然生态系统都不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原貌,而是自然生态系统在该种文化中的变形印象。每个民族都是凭借这种印象去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当然也就无法避免了。而在当代演变为水土

流失灾变和生态危机,则是因偏离的积累和叠加而导致的总爆发,我们决不能因此将生态灾变的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最近几十年的人类行为。因而,不少学者明确地提示我们“生态文化”决不仅仅是指当代的民族文化或者是在当代民族文化基础上人为建构的一种文化,而应是人类社会有文化以来的共性问题。

那么,生态文化尤其是广义的生态文化并不是或者并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的文化类型。而是一个相当广泛、普遍的文化学意义上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包含并用以揭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所有阶段、所有类型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模式。因为迄今为止的任何文化,从本质上说都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某种推演和表现,都属于生态文化的基本范畴。^[5]

事实上,人类种群的生物性已经规定了人类在生物性意义上说仅是一个普通物种,无论其如何建构文化都得立足于这一本质特征。因此,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生物性,同时又偏离于生物性,才能确保文化能将人类维系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于地球生命体系的能动群体。以往的文化研究关注文化超出于地球生命体系的那一个部分,即它的社会性部分,却忽视了文化的生物性部分。这导致了人们对于生态危机只有在其临头时才有所警觉。当然,这种警觉有助于提醒人类对自身生物性的认识,承认自己建构的文化始终包含了生物性的一面。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是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

三、文化建构的社会性法则

文化的建构不仅具有生物性的一面,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从这一侧面理解,人类社会不仅仅是从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生命物质、生物能和信息,还可以凭借群体的力量将正常情况下地球生命体系中所没有的物理化学过程及其相伴的物质能量形态引入自然生态系统中,使它们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命过程并存。人类社会这一做法更多仅是对人类自身有利,对地球生命体系而言则是一种损害。例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仅用地球生命体系中的生命物质如木材作燃料,还进而

采用各种化石能源作为燃料,最后使用了核燃料。为了获取能源而引进的这些物理化学过程,并不是地球生命体系正常运行中存在的内容,其对地球生命体系的损害也是十分明显的。

人类的社会活动由于需要引进无机的物质及其物理化学反应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损害,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些社会活动内容中偏离了地球生命体系,为人类自身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却不断地给地球生命体系制造各种各样的创伤。问题的矛盾在于,人类若不拥有这些内容,它就只能是一个普通的生物物种;但有了这些内容后,人类又会伤害自己的“寄主”——自然生态系统,并最终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报复,使自身的发展面对重重的阻力。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能仰仗于人类对自身做出节制,将这些无机的物理化学过程和产品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地球生命体系正常运行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文化的社会性建构其实早就体现了这种节制,只是同生物性建构一样,对于无机世界人们也是了解多少认识多少,并凭借这种有限的认识去建构文化。因而不管哪个民族的文化,从建构时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以后的运行中虽说可以凭借新获得的认识和理解对文化进行修正,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对引入这些无机的物理化学过程到地球生命体系中究竟会诱发什么样的后果,仍然说不上有全面彻底的把握。文化的社会性建构天生存在的这种片面性,长期积淀后自然会爆发出生态危机和水土流失灾变。而当危机和灾变爆发时,人类社会同样会因为相关文化存在的片面性,使得单一的民族文化无法承担起救治灾变和缓解危机的使命。同样需要多元文化并存,从中发现各种文化的片面性以及这样的片面性如何扩大和叠加,才能找到对付灾变和危机的办法。

文化的社会性建构也需要一整套能有效调控人类社会生活的信息,这样的信息由于人类生物性的客观存在,因而它是从自然生态系统的信息蓝本加工改造而来。例如,人类认知无机世界在开始时总不免从自己的感触出发去赋予各种无机物与无机的物理化学过程的属性。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过万物有灵的思维时代,在这种状况下,文化是凭借人类的生物性感受去认识和理解无机物和无机的过程的,在以后的不断修正和提高中,才逐步地将无机物与生命现象剥离开去。但这种剥离并不会彻底,因为要对无机世界做出进一步的理解,最终还

得通过人的接触和感受。而这样的接触和感受又是带上了生物属性的,以至于在自然界并没有存在价值的无机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赋予其价值,附会进不同的象征意义。这种价值认定和象征意义赋予又因民族而异,因文化而别。民族间的这种不相协调性在今天往往表现为在人类应对生态危机挑战和水土流失灾变时很难协调一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引进无机过程和无机能源及物质已经对文化的建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建构起来的文化同样表现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而偏离的扩大和叠加同样会导致生态危机和水土流失灾变。然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会像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那样,也离不开这些无机物质和能源及其相应的物理化学过程。文化的建构显然得将自然生态系统的和非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整合起来,通过同一的信息体系对它们加以调控。其中,对非生命形态的物质和能量调控主要得借助文化建构的社会性信息。

文化建构的社会性信息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这样的信息必须具有很高的同一性。这是为了确保获得最大的社会凝聚力,使文化维系的社会个人能按照基本同一的行为方式去处置无机的或有机的各种物质和能量交换。从人类自身的社会发展而言,凝聚力越大也就越有实力,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和各种无机资源,也更有力量对抗并存民族的挑战。一种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母语正是这种社会性信息的总汇。由于这样的母语对其他民族可以构成信息交流的屏蔽,因而反过来更增强了本民族的凝聚力。

其二,建构社会性的信息也会按照各民族的实际特点,对无机资源、无机过程赋予不同的价值,并附会进不同的象征意义。而这样价值和象征意义的赋定是因民族而异的,不同民族对同一自然事物的态度和取向会因文化差异而截然不同。应当看到,这样的价值和象征意义赋定不仅对民族成员的行为协调至关重要,而且还会支配人们对不同自然物的态度和处置办法,从而造成各民族处置和对待各种无机事物的明显差异。在并存民族文化相互制衡并达成稳定格局时,这种差异可以使人类社会对各种自然物的利用在不自觉中达成均衡,客观上起到矫正不同民族文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偏离的作用。

其三,各民族的信息体系建构还需要对引进的无机物质、能源及其物理化学过程在民族生境中按照该种文化的需要做出有序的配置。这种配置可以

确保人类社会性非生命的物质和能量流动与有生命的物质和能量流动尽可能地相对隔离,尽量减少这些内容对自然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创伤。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做法。无论是哪个民族,在其分布范围内都会很自然地呈现为相互关联的若干个部分:有的是在该民族引进无机物质、能源及其物理化学过程的集中地带,可以称为“人为改性地带”,如在农业民族中的集镇、手工作坊、社区,工业民族的工矿企业和大都会等;有的则是在该民族与自然生态系统间密集从事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区段,可以称为“生物交换带”,如农业民族的农田、游牧民族的牧场、刀耕火种民族的烧畲地和狩猎民族的猎场等;有的地段则是该民族暂时搁置,基本不加以触动的区段,可称为“封禁带”,如现代工业民族设置的自然保护区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农业、游牧等民族则往往是以宗教名义将大片的区段搁置起来,让其基本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生状态;另外还有一些区段属于相关民族社会配置的“过渡带”,其使用目的根据形势需要而做出安排,这种缓冲地段具有应付不可测风险的功能,对相关民族文化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

按照上述三项特征完善起来的社会性信息具有极强的兼容能力,它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又能有节制地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资源,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引进无机物质、能源及其物理化学过程对自然生态系统构成的损伤。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社会性信息建构并不是要与自然生态系统对立,而是力求相互兼容,因此,文化的社会性信息在其正常运作的过程中所规约的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冲击,同样表现为一种有节制的适度行为,并不会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和水土流失灾变的出现。

因此,当代面对的水土流失灾变和生态危机,从文化的社会性信息着眼,也只能是文化非正常运行的派生产物。当今世界上水土流失灾变主要在如下三种地带出现:一、民族分布的边缘地带,特别是该民族原有配置中的过渡带或封禁带;二、多种文化交错分布的毗连地带;三、本民族分布区被外民族占据而高度压缩的残存生息带。上述三种灾变频发地带其共同点在于,相关民族的文化都处于一种非正常的运行状态,而这样的非正常运行正好为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偏离的扩大与叠加创造了条件,最终酿成在文化正常运行下不会出现的生态危机。

文化建构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在实质上是两个对立统一的信息调控系统,由于它们各自都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复合结构,每个层次内又都包含着众多的结构单元,因而它们在同一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是文化制衡的一种最基本、最能动的单元。每个民族的社会行为都由这种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制衡去加以规约,并对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做出近乎一致的反馈。因此,把握同一文化内的这种制衡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冲击由部分偏离到逐步激化的发展线索,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偏离和叠加如何直接诱发生态危机爆发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治理生态灾变的一个重要依据。

无论是文化的生物性建构还是社会性建构,其建构方式都会使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在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时保留有很大的余量。即使在水土流失灾变发生后,在实施灾变救治时我们仍然保留有较为广阔的回旋空间。这一认识往往为众多的研究者所忽视,以至于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当代的生态危机和灾变几乎是人类的不治之症。而事实表明,只要通过文化的调适作用,稍加改变利用的办法,在本民族的分布区内凭借本民族的力量完全可以解决很多原先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推而广之,其他地区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和灾变,也应当可以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获得有效的救治和妥善的解决。

由于文化建构中生物性与社会性是两个相互制衡的侧面,因而就在一个民族文化内部也可能表现为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互换性和替代性。然而很多人在分析水土流失灾变成因、规划水土流失灾变救治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各式各样的救治规划总是体现为依赖单项的工程和单一的措施去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类似的救治对策绝大多数无法收到实效,原因正在于不能有意地利用文化制衡关系的运行特点。例如,很多在甘肃、宁夏实施的扶贫计划中,都把贫困的原因归因于自然环境恶劣,而环境恶劣的主要表现就是缺水。于是所有的规划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提黄灌溉,这些规划者其实忽略了一个不该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这种工程方式虽然能缓解一段时间的危机,但却不能因此有效提高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探寻新的水资源补给渠道,从而实现对所在地区水土资源的更有效利用。于是,相关民族文化建构中对资源的利用

尽管留下了众多回旋的余地,可以对消解危机发挥作用。但这些回旋余地一直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利用起来,致使类似的扶贫规划不仅不能持续生效,反而因此更诱发了土地的盐碱化,人口的超载以及对黄河水资源的过分依赖。这些显然不是扶贫规划者的初衷,但却不可避免地陆续暴露出致命的缺陷来。

对付生态危机和水土流失灾变,其立足点必须依托于各民族文化中的生物性建构。但文化中的生物性建构和社会性建构始终处于一种制衡关系之中,如果社会性建构出现紊乱,文化的调适与重构的取向都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性建构倾斜,这就必然搁置生物性建构的调适和重构,一切救治水土流失灾变的努力都会因此而失效。相反地,若保持各民族内外社会环境的稳态延续,将生态危机或灾变的事实摆到相关民族面前,使其认识到那是关乎自身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么在压力面前,各民族文化中的生物性建构也会因此而启动。这些民族文化建构中原先预留周转余地,便会在各民族主观能动的运用中发挥作用。

为此,从文化建构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并存的认识出发,我们主张救治生态危机和灾变时应当充分相信各民族,从外部为他们铺垫一个相对安定的族际和族内社会环境,使其文化中的社会性建构保持

稳态的延续,相信他们,鼓励他们通过文化的重构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文化的生物性建构才能启动其调适功能,错综复杂的水土流失灾变才可望得到根治。在这种通过文化重构救治灾变的过程中,必要的优惠扶助当然需要,但决不能越俎代庖,那样只会紊乱文化中的社会性建构,造成运行上的波动,最终导致当事各民族产生依赖性,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必须认识到,扶助只能救急而不能治本,复杂自组织系统的缺损不可能通过单一的资金投入或政策优惠达成恢复,必须依靠复杂自组织系统本身去完成修复。以往水土流失灾变救治的成效不理想,其症结正在于救治思路有偏颇,没有注意到文化制衡的运行特点和效能,应当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 [1] [美] C. A 托卡列夫. 外国民族学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8.
- [2]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 [3] [美] 斯图尔德·J·H.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J]. 民族译丛, 1983, (6).
- [4] 陈庆德. 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J]. 广西民族研究, 2000, (4).
- [5] 袁国友.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创新、转换与发展[J]. 云南社会科学, 2001, (1).

Dual Character of Cultural Constructure

—Also on Cultural Ecotype of Eco-crisis and Its Solution

LÜ Yong-feng

(Anthropology and Ethnics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culture depends on its system and therefore,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mpact of human society on the source of water and soil, the balance control of its own will be dealt with first, which is decided by its structural features. The existing human culture in its essence is operated by two sets of laws — — the biological laws and social law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ame culture these two sets of laws can either closely linked or disjointed to a extent. While linked closely it displays its great vitality but in confusion it will show its degradation and produce its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eco- system of the nature and the source of water and soil concerned as well, hence causing eco- crisis. The paper lays its stress on the double laws of cultural establishm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mutual controlling balance and how to display the supporting function of cultural stable continuity of the natural eco- system. In addition, counter- measure for the solution of eco- crisis is also put on agenda.

Key words: eco- anthropology; cultural structure; eco- crisis; dual features